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第三辑）

Nationality, its Nature and Problems

民族论

约瑟·伯尔拿 (Bernard · Joseph) 著 刘君木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第三辑)

Nationality, itz Nature and Problems

民族论

约瑟·伯尔拿 (Bernard Joseph) 著 刘君木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论/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
ISBN 978-7-5520-1792-2

I. ①民… II. ①李… III. ①民族问题—研究—世界 IV. ①
D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84号

民族论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9.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92-2/D.435

定价: 98.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2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約瑟·伯爾拿 (Bernard · Joseph) 著 劉君木 譯

民 族 論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初版

譯者序

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似較淺顯易明。然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每混為一談；高談世界主義者常揀救民族主義，故民族主義也偉民權民生主義那樣，有待於闡揚。澎湃的民族風潮，在歐洲雖或已成過去，在東方尚方興未艾，中國民族運動發軔在數十年前，然所成功者，僅是滿族統治權之推翻，被壓迫民族地位之解除實不容緩。

近年引伸孫中山先生民權民生之說，作為專書，或邊譯國外論民主政治與社會政策名著，以與孫先生學說相參較者，為數尚不少，至於探討民族性質和問題的著作，則幾不可見，譯者之所介紹約瑟博士大著，就是想彌補國內出版界這種缺陷。

本書對於民族的性質和問題，先加以分析，繼作為綜合的論斷，益以歷史的觀察和平允的批評。約瑟博士之論述東方民族運動，祇有隔膜之處；其提倡國際聯盟，推重國際主義，誠未可以與泐大同之道，然以大體論，實足資國內研究民族問題與民族主義者的參攷。

本書原名 "Nationality, its Nature and Problems"。"Nationality" 一字本含有民族，民族制度，民族思想，民族主義等概念，茲簡譯為「民族論」。本書附篇雖有正名一章，然所引據各作家仍每將名詞混用，譯者殊費斟酌，惟有多附原文，或較易明瞭，如有舛誤，深希讀者指正。

——譯者 一九二五，六。

自序

我久抱一見解，以爲民族原則得到完全承認，然後社會才有圓滿而持久的基礎。本書就是欲在見於載籍的人類特性和經驗中，尋得實據，以證明這個信念的研究的結果。我既把民族的屬性（因素）加以分析，又從好些重要民族的過去發展中，驗其作用，我便試衡各樣因素的相對上的重要。基於這種分析，我竭力尋出民族的木質和真正意義之所在。此外，我這企圖對批評民族的論調加以解答，論述民族的主要問題，和證明牠是把人類再行區分的唯一的合理和適當的根據。

民族是一種非人力所能統制的社會勢力，其爲情緒深入於人性之中。若勿視了牠的力量，或否認其必要，不能理悟歷史之教訓，和了解人性。一切其他的理論都不能夠給予社會的適當的結構以適當的詮釋，和明瞭那些同屬一民族的人們爲甚麼會自然相吸引。這問題在現在和將來，雖是極端重要，但目下仍未得我們相當的研究和考察。我不自揣，相信本書所做的工作，稍可彌補這個缺憾。若使我研究所得仍未儘如所期望，我希望我的努力至少可以使人再憶起民族情緒對人類及其命運的影響之大，和牠對於社會福利之必要。

本書原來是爲預備倫敦大學哲學博士論文而作，今雖略加修訂，而大體上無大分別。因此

，幸有得拉斯基教授 Professor Laski 和顧治博士 Dr. C. P. Gooch 批評的機會。兩先生不吝指正，後者且爲之作序，作者感謝殊深。我的朋友 Mr. Max Nurrock、Mr. Harold L Ginsburg 和 Mrs. M. L. Basa 爲之校讀，且多所啓迪，Mr. Vidor N. Levi 爲之校對，均應附此致謝。最後，內子與我一生同注重這個問題，沒有她的不斷的鼓舞和贊助，我所欲自効的工作，恐怕至今還未完成，故也應在此表我深切的謝忱。

一九二九年三月伯爾拿約瑟雜誌於耶路撒冷。

顧治博士序

我們在二十世紀的最重要的建設工作就是新的國際秩序的建立。可是，如要我們組織世界的努力得有成效，我們必須明白我們所承襲的和所欲改善的制度的優點和劣點。民族像家庭一樣，是文明的柱石之一，明白的人總不會夢想到牠的覆亡。持久的進步，非一蹴所能致，而是變通和補充過去的理想和制度的結果。故傳統與試驗必須攜手，才得到進步。

當我們說到中世紀末以來——特別是十九世紀——民族作用的重大時，我們便覺得很奇怪，為甚麼非等到世界大戰，使我們通都想及民族的危險和要求的時候，對於民族的性質總沒有多大的研究。牠的最大的闡釋者馬志尼，芮農的饒有意義的論文何謂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揭其輪廓，後人詳細的研究以之為根據。但是，只當近年世界大戰和改造期間，全世界的歷史家和政論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才對此問題細加考察，與數百年來考察統治權或國家性質一問題時無異。新近在英美已見有一些有價值的論文和著作，對於近代的民族的有形和無形的因素加以釐定和分析；民族的研究在實際政治和政治科學的大問題中，終於佔得其應佔的位置。但是，在這個園地裏，仍有不少新的工作可做。

約瑟博士的大著，使討論這個異常複雜的問題者見之，自視為可珍的貢獻。博士之撰此書

，既胸有成竹，復助之以縝密的判斷力，對於全題能一覽無遺；凡有關於此問題而值得一讀之書，他都看過，如有所得，必深思而後握筆。以我愚見，他的長處，在於他的孜孜不倦和兼收並蓄的精神。他不肯偏重一面，也不肯輕於把這問題過度簡單化。他總不忘記，也總不教讀者忘記，他所論述的是人類經驗中的最重大問題之一。然當其衝量民族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情緒時，又不故事翹張，立言極有分寸。他以爲後者之產生，不是因爲前者之虛妄，而是因爲前者之尚未足；要求人類統屬範圍廣大的新的呼聲，也是起於人類的本能和情感的深泉中，與原始時期人類的合羣下意識同一淵源。

約瑟博士對民族的論列，先從牠的主要因素——種族，語言，宗教，國土，傳說，文學和共同生活的意志——研究起。所謂種族純粹既已知是無稽之談，故種族的自覺雖仍不變，但就血統而言的種族因素已遠不如從前之重要。宗教的凝聚力，也不像從前那樣爲人所重視，但在猶太人中；宗教的力量仍不可侮。在他方面，共同語言，和故土情緒兩因素，極見注重。往日的英雄事蹟和慘受壓逼的回憶，動人的文學，都足以助進那合羣的意志的形成和建立，而這種意志就是民族之所以鞏固和持久的最後的原因。

既把這個強有力的情緒的各種因素分析之後，約瑟博士在本書下半部進而研究民族的歷史的起源和散於全世界的民族。歐洲各民族簡括地論述於第十三章一章，而不列顛帝國，印度，猶

太人和美利堅人則各有專章。亞洲民族的研究，得東方民族集團一章之補充，而更完備。專論猶太人一章特饒意味，作者對於巴力斯坦的耶山黨人的努力，極表敬佩，他以爲這個運動卒能給予猶太人以「自然的和常規的民族地位。」

至本書之末，作者重作民族意義的討論，說明牠對於國家，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戰爭的關係，和綜核其得失。這個焦體情緒既已達到一個危險時期，若沒有更廣大的概念爲之補充，將漸爲世界之累。這種發展，現代的民族主義者固不以爲異，卽一百年前馬志尼亦已預言及之。「人類是民族的結合」，本書屢曾提及的動人的先覺說：「牠是爲實現和平和愛的使命的民族的聯盟。忘記了人類等於放棄了我們工作的目的，取消了民族不曾拋了我們達到目的的工具。」約瑟博士浸淫於這幾句動人的話的真理中；他自己的名句「民族是個人和人類間必須的環線」，可以視爲這本饒有意味而湛深淵博的大著的點睛語。

顧治繼序

民族論目次

譯者序

自序

顧治博士序

第一章	名詞的釐定	一
第二章	種族與部落的天性之爲民族的因素	一三
第三章	民族的語言因素	三三
第四章	宗教之爲民族的因素	四七
第五章	國土對於民族之重要	五七
第六章	傳習之爲民族的因素	七三
第七章	民族的文學教育與文化	八一
第八章	民族的自覺與求爲民族的意志	九一